

# 能力分配、制度兼容性和战略关注度： 冷战后亚太多边经贸合作制度构建的 成败分析<sup>\*</sup>

叶成城

内容提要：冷战结束后，亚太地区以经济合作制度为主的各类制度建设迅速发展，并嵌入到地区秩序中，这些制度的发展经历了不同的历程，产生了不同的结果。从制度变迁理论的视角来看，地区制度的发展历程可以分为制度需求、制度构建和制度的维持与深化三个阶段，不同因素在各阶段发挥的作用不同。具体而言，在亚太地区，能力分配、制度兼容性和霸权国对地区的战略关注度这三个变量对于地区经贸合作制度构建的成败起到了决定性的影响。文章将后冷战时期的亚太制度变迁分为四个时期，通过考察各个时期内最具代表性的制度来检验上述理论假设。文章认为，当地区内大国力量对比悬殊时，只有同时具备较高的霸权国战略关注度和较强的制度兼容性时，地区合作制度的构建才能成功；当地区内力量对比接近时，地区合作的路径会趋于多元化，具备较高的霸权国战略关注度或具有较高兼容性的地区合作制度的构建都可以获得成功。因此对于中国而言，在霸权国对地区合作的战略关注度下降和大国力量对比接近时，要推动当前地区经济合作，需要保持战略定力，更多着眼于地区合作中的互利共赢。

关键词：能力分配 制度兼容性 战略关注度 亚太多边经贸合作制度

作者简介：叶成城，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

<sup>\*</sup> 本文系上海市社科规划青年课题“逆全球化对美国地缘经济战略的影响研究”（课题编号：2019EGJ004）的阶段性成果。感谢刘鸣研究员的悉心指导，感谢黄仁伟、李巍、潘忠岐、唐世平、余建华、夏立平、张胜军等学者和《当代亚太》匿名评审专家的宝贵意见。文中错漏由笔者负责。

---

《当代亚太》2020年第1期，第86~112页。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sia-Pacific Studies (Bimonthly)

## 一、问题的提出

在冷战后至今的近 30 年内，亚太地区制度大量兴起，以经贸合作为主的各类制度也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并嵌入到地区秩序之中。同欧盟逐渐形成超国家行为体的一体化模式不同，亚太地区则形成了以双边经贸协定和论坛性质的多边合作制度或规制（regime）为主的模式。<sup>①</sup>这一时期内，不同地区制度的发展过程不尽相同：一些有利于实现帕累托改进的经贸合作制度因为政治因素而未能构建；一些制度最初虽取得一定成果，最终却逐渐虚化为“首脑俱乐部”或者“清谈馆”；极少数制度取得了一定的进展，部分推动了亚太地区经济一体化的进程。随着总体实力不断增长，中国作为世界上主要的经济体，将在亚太地区扮演越发重要的角色并承担更多的大国责任，而这些地区经贸合作制度也是中国发挥大国作用的重要舞台。显然，正确理解亚太地区经贸合作制度构建成败的逻辑，对于中国参与地区秩序的塑造具有重要的意义。

本文试图尝试提出和讨论如下核心问题：冷战后亚太地区多边经贸合作制度的构建成败主要受到哪些变量的影响？这些变量是通过何种因果机制影响其构建过程的？

在具体讨论之前，我们还需要说明如下几点。首先，由于苏联解体前后的国际格局是截然不同的，为避免讨论外延的无限扩大，本文选择冷战后至今的亚太地区作为案例选择的时空范围。<sup>②</sup>由于不同时期的历史情境存在差异，通常更为合适的做法是选择相同时期内的案例进行配对比较分析（paired comparison）。<sup>③</sup>我们将地理范围选择为“亚太”而非“东亚”的原因在于，东亚地区的经贸合作受美国因素的影响过大，并且许多地区合作规

---

① 为了区分英文词汇 mechanism 和 regime 的不同涵义，本文将前者译为机制，而将后者称为规制。参见刘丰、张睿壮：《关于几个重要国际关系术语中文译法的讨论》，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 年第 10 期，第 71 页；唐世平、王明国、毛维准：《国际制度研究需要准确的翻译》，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 年 9 月 12 日，B03 版。

② 关于案例选择的时空范围，参见叶成城、黄振乾、唐世平：《社会科学中的时空和案例选择》，载《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8 年第 3 期，第 145～155 页。

③ Sidney Tarrow, “The Strategy of Paired Comparison: Toward a Theory of Practice”,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Vol 43, No 2, 2010, pp 230-259.

制在地理上都以“亚太”冠名。其次，多边制度往往包含了诸多的行为体，集体行动的合作逻辑不同于“小集团”，因此，本文不讨论双边或少边的自由贸易区（如北美自由贸易区）。<sup>①</sup>最后，经贸合作制度意味着排除了地区安全合作制度（如东盟地区论坛）或缺乏特定推动地区经贸一体化目标的纯会议性质论坛或规制（如博鳌论坛、太平洋经济合作理事会等）。

全文共分为六个部分。第一部分提出问题。第二部分讨论了既有的地区制度理论及其不足，第三部分在此基础上给出本文的分析框架，将地区制度变迁分为三个阶段，阐述了不同变量和机制在这三个阶段中所发挥的不同作用，并提出用于检验理论的三个基本假设。第四和第五部分分别讨论了冷战结束后至今四个不同时期的亚太地区制度变迁，通过察看东亚经济集团（East Asia Economic Group, EAEG）、亚太经合组织（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APEC）、东盟与中日韩（10+3）规制（ASEAN Plus Three, APT）、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TP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RCEP）等地区合作制度的发展历程来检验理论。第六部分基于假设检验的结果总结出亚太地区制度变迁的逻辑，并给出相应的政策启示。

## 二、既有地区制度理论及其不足

地区制度变迁是国际关系研究中的重要问题之一。对于东亚或亚太地区来说，由于受到历史恩怨和现实政治的影响，在可预见的短期内，很难形成像欧盟那样的一体化趋势。另外，中美等国在安全领域存在一定的竞争性，多边经贸合作成为亚太地区制度构建的最重要形式。需要看到的是，亚太地区经贸合作制度变迁的过程十分复杂，该过程既有成功的案例，同时也伴随着失败、停滞、退化或者诸多不确定性。从学者对制度变迁已有的研究中可以看到，制度变迁的成败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无论是理论分析还是具体关于地区经贸合作制度的研究，在国际关系领域中，关于亚太地区合作制度的讨论仍带有一定的范式色彩，各学派往往从各自的视角强调其范式内的相应变量在推动地区制度构建中的核心作用。根据变量类型的差异，已有的研究

---

<sup>①</sup> 参见曼瑟尔·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陈郁等译，格致出版社2018年版。

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1. 功能主义。制度主义的理性选择流派认为，制度是由规则和行为诱导构成的各种体系，在这些体系中，个体努力将他们自身的效用最大化，这种模式明显是功能主义的，他们认为，制度的出现是为了满足社会和经济需要。<sup>①</sup> 功能主义理论主要从制度的需求和制度所带来的效益两个层面讨论地区制度变迁。在制度需求层面，经济学家罗伯特·蒙代尔（Robert Mundell）提出通过地区货币一体化来降低交易成本，促进要素和产品流通。<sup>②</sup> 新自由制度主义将这部分逻辑引入到国际制度研究中，认为国际制度通过提供规范、原则和程序来促成互惠合作。<sup>③</sup> 具体而言，地区组织通过形成区域集团、增加交易、功能性连接，就能够影响一国内部的政治，并形成呼吁一体化的利益群体。<sup>④</sup> 在制度维持与深化层面，功能主义强调制度效益在其中发挥的作用。理查德·鲍德温（Richard Baldwin）认为，一体化会通过贸易转移效应形成“多米诺效应”并进一步促使各国加入区域组织。<sup>⑤</sup> 有学者考察了亚太地区的几个制度构建，认为组织间架构的制度化水平和议题的网络外部性有利于制度的推进。<sup>⑥</sup> 功能主义将制度变迁视作为满足特定需求的自发行为，其面临的最大问题是难以解释扭曲效率的制度经常存在，而可以实现帕累托改进的地区制度却未被推进，并且这类研究时常忽视理论无法解释的案例，在方法上也存在一定选择性偏差。

2. 权力主义。现实主义以及部分新制度主义的支持者将制度视作权力斗争的工具，并将制度变迁成败的结果也视为权力的产物。在制度需求层面，传统现实主义理论家质疑国际制度的作用，仅将其视作是干预性变量或权力

---

① 功能主义可以视为制度主义中的流派之一，它不同于强调政府结构的经验制度主义和关注早期事件影响的历史制度主义等学派。参见盖伊·彼得斯：《政治科学中的制度理论：新制度主义》，王向民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9~20页。

② Robert Mundell, "A Theory of Optimum Currency Areas",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4, No 51, 1961, pp 657-665.

③ Robert Keohane, "The Demand for International Regim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36, No 2, 1982, pp 325-355.

④ Joseph Nye, "Comparing Common Markets: A Revised Neo-Functionalist Model",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 No 24, 1970, pp 796-835; Joseph Nye, "Comparative Regional Integration: Concept and Measurement",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 No 22, 1968, pp 855-880.

⑤ Richard Baldwin, "The Causes of Regionalism", *The World Economy*, Vol 20, No 7, 1997, pp 865-888.

⑥ 刘玮：《崛起国创建国际制度的策略》，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7年第9期，第84~106页。

的副产品。<sup>①</sup> 约翰·伊肯伯里 (John Ikenberry) 则将国际制度视为战略性约束的工具, 认为美国可以通过国际制度让中国的权力在其制定的规则和范围内实行。<sup>②</sup> 在制度构建层面, 现实主义强调制度供给需要大国权力作为基础, 认为大国必须作为国际公共物品的提供者。<sup>③</sup> 在地区内同样如此, 有学者认为, 需要有一个无可争议的霸权或者仁慈的领导者来协调规则、条例和政策。<sup>④</sup> 但也有学者看到霸权国在东亚地区经济合作中的消极作用: 一方面, 东亚国家/地区与霸权国的经贸往来分散了对作为地区大国日本的经济依赖, 而美国也可以通过对盟友施压而影响一体化进程;<sup>⑤</sup> 另一方面, 霸权国会试图操纵当地分裂, 以使自己获得经济和政治的好处。<sup>⑥</sup> 政治现实主义是对功能主义的重要批评和补充, 其优势在于能够从制度需求和制度构建层面解释为何不合理的制度时常存在, 但它却难以解释行为体对于制度的主动遵守和维护。

3. 观念主义。观念主义将制度视作是规范和利益建构的产物, 认为规范可以通过建构国家的共识性利益来推动制度发展。<sup>⑦</sup> 在制度需求层面, 观念主义讨论了传统文化对东亚地区合作制度的作用。康灿雄 (David C. Kang) 认为儒家文化传统可以促进地区稳定, 历史经验表明, 东亚更喜欢强大而非

---

<sup>①</sup> Susan Strange, "Cave! Hic Dragones: A Critique of Regime Analysi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36, No 2, 1982, p 479; Steven Krasner, "Structural Causes and Regime Consequences: Regimes as Intervening Variabl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36, No 2, 1982, pp 185-205; John Mearsheimer, "The False Promise of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9, No 3, 1994, pp 13-14.

<sup>②</sup> John Ikenberry, "Rise of China and the Future of the West: Can the Liberal System Survive?", *Foreign Affairs*, Vol 87, No 1, 2008, p 37; 约翰·伊肯伯里:《大战胜利之后: 制度, 战略约束与战后秩序重建》, 门洪华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 第 48~49 页。

<sup>③</sup> Charles Kindleberger, "Dominance and Leadership In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 Exploitation, Public Goods, and Free Ride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25, No 2, 1981, p 247; 罗伯特·吉尔平:《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 杨宇光等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 第 81~84 页。

<sup>④</sup> Walter Mattli, *The Logic of Regional Integration: Europe and Beyon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43.

<sup>⑤</sup> Peter J. Katzenstein and Martin Rouse, "Japan as a Regional Power in Asia", in Jeffrey Frankel and Miles Kahler eds., *Regionalism and Rivalry: Jap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Pacific Asi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3, pp 217-244; 卢光盛:《地区主义与东盟合作》, 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8 年版, 第 113 页。

<sup>⑥</sup> 巴里·布赞:《地区安全复合体与国际安全结构》, 潘忠岐等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0 年版, 第 168 页。

<sup>⑦</sup> 参见 Oran Young, "International Regimes: Problems of Concept Formation", *World Politics*, Vol 32, No 3, 1980, p 348.

虚弱的中国。<sup>①</sup>但也有学者认为，东亚多元主义的文化和殖民记忆不利于地区合作，因为东亚国家对主权让渡更为敏感，更加倾向于建立“软制度”而不是有较强约束力的“硬制度”。<sup>②</sup>在制度维持和深化层面，观念主义探讨了规范和文化对深化地区合作的促进作用。阿米塔·阿查亚（Amitav Acharya）通过研究东南亚地区一体化进程，发现在地区化过程中，区域化可以重新对安全共同体进行社会建构，并以此种方式对地区大国进行社会化。<sup>③</sup>观念主义最主要的案例是作为次地区合作经验的“东盟方式”在亚太地区的推广。东盟通过吸引大国参与合作进程，并渐进式地推动权力的社会化，并将地区相关大国纳入东盟的关系网络中，以对关系进行主动管理和调节。<sup>④</sup>观念主义的理论弥补了理性主义中行为体单一偏好的假定，解释了为何中小国家可以从进程和规范层面塑造和影响国际制度，以及一些观念和规范是如何社会化的，但其往往也忽视了制度的权力基础，因而同样难以解释为何许多进步的观念没有被实行或制度化。

虽然上述几类理论在讨论制度变迁的特定阶段时都有着诸多精妙的论述，能够从各自的假定和视角阐述对于制度变迁不同阶段的分析，即分别从制度需求、制度构建与制度的维持和深化三个方面，讨论了权力、观念和制度收益等要素在制度变迁过程中对于制度构建成败的影响。如表1所示，各大流派的理论分析仅涉及了制度变迁的一个或者两个特定阶段，因此时常无法解释制度变迁的全部过程。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从制度变迁的视角，将上述变量置于具体的过程与机制中，来考察每一个阶段不同类型变量的作用，提出一个解释地区制度变迁的分析框架，从而得出冷战结束后至今

---

① 参见 David Kang, *China Rising: Peace, Power, and Order in East Asi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8。

② Mark Beeson, “ASEAN’s Ways: Still Fit for Purpose?”, *Cambridg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23, No 3, 2009, pp 333-343; 迈尔斯·卡勒：《合法性有地区限制吗？》，载王正毅等编：《亚洲区域合作的政治经济分析：制度建设、安全合作与经济增长》，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17~118页。

③ Amitav Acharya, *Constructing a Security Community in Southeast Asia: ASEAN and the Problem of Regional Order*, New York: Routledge, 2009, pp 3-4; Amitav Acharya, “How Ideas Spread: Whose Norms Matter? Norm Localization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 in Asian Regionalis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8, No 2, 2004, pp 239-275。

④ 秦亚青、魏玲：《结构、进程与权力的社会化——中国与东亚地区合作》，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7年第3期，第7~15页。

亚太地区主要经贸合作制度成败的原因。

表 1 各大流派与制度变迁的不同阶段

	制度需求	制度构建	制度维持/深化
功能主义	✓		✓
权力主义	✓	✓	
观念主义	✓		✓
制度变迁理论	✓	✓	✓

注：✓ 表示涉及该阶段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 三、亚太地区制度变迁的动力：机制、因素与假设

借助制度变迁的广义理论，本文将特定地区合作制度的变迁过程分为三个阶段：制度需求、制度构建、制度维持和深化。一旦地区制度变迁在任何一个阶段遇到障碍，都会导致无法形成实质有效的地区合作制度。<sup>①</sup> 第一个阶段是制度需求的产生。制度需求的重要性在于，它是推动新的制度变迁的契机，如果没有相应需求，地区内各主要行为体则不会“想到”去构建新制度或推动既有制度的发展。第二个阶段是权力斗争与制度构建。制度构建受权力因素的影响较大，因而这一阶段大国博弈最为激烈，各国都会动用各类权力来影响规则制定，以锁定未来的收益。第三个阶段是制度的维持与深化，该阶段基于地区认同和制度内化，依靠国家的自觉遵守来形成规范性共识。此外，制度的维持与深化又会进一步加强地区内的政治经济纽带，出现新的制度需求，成为新一轮制度变迁的基础。

由于各流派的理论没有涉及制度变迁的全部阶段，因此，本文基于地区制度变迁的视角提出了如下分析框架。制度需求、制度构建、制度维持和深化可以被视为是制度变迁过程中的“理想化”模式（成功案例）。<sup>②</sup> 但是地区合作在具体实践过程中往往会因为缺乏特定的要素（观念、权力或制度共容性等），使得制度变迁无法具备足够的“动力”从而令机制“中止”在特定

<sup>①</sup> Tang Shiping, *A General Theory of Institutional Change*, London: Routledge, 2011, p 34; 关于制度变迁阶段的讨论，同时也参见 Robert Keohane and Joseph Nye, *Power & Interdependence*, pp 47-48。

<sup>②</sup> Ryan Saylor, “Why Causal Mechanisms and Process Tracing should Alter Case Selection Guidance”, *Sociological Methods & Research*, June 4, 2018, <https://doi.org/10.1177/0049124118769109>.

阶段，最终输出与理想的成功模式不同的结果（失败案例），如出现制度停滞、退化的情况。<sup>①</sup>而衡量因变量——地区经济合作制度构建的成败——存在两个指标：一个是浅层次的指标，即是否在形式上具备明确的制度安排，如常规化的磋商规制以及相应的组织机构；另一个是深层次的目标，察看的是相应规制是否加深了地区合作的制度水平，如实质性的经贸增长和贸易壁垒的消除等。只具备前者而无法达成深层次目标的规制往往会沦为“首脑俱乐部”，可以视为“半负面案例”。<sup>②</sup>如图1所示，在制度变迁的不同阶段受到各类因素/变量的影响，这些因素/变量通过不同的因果机制作用于制度变迁的不同阶段，从而最终影响制度变迁的结果。根据前述理论所阐述的3个变量的不同特性，本文给出用于检验理论的3个基本假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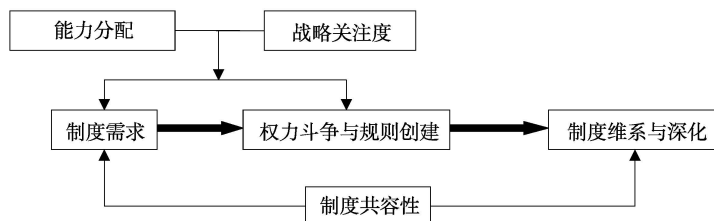


图1 亚太地区制度变迁的理论框架

注：粗箭头表示制度变迁的进程，细箭头表示核心因素对其干涉作用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第一，大国间的能力分配决定了各国在规则创建的博弈阶段中所能动用的权力，它是制度构建中的结构性因素。本文用大国力量对比接近和大国力量对比悬殊来衡量大国间的能力分配。如图1所示，它通过影响地区制度构建的需求和创建阶段来影响地区制度的变迁。在制度需求阶段，当地区制度构建存在更多政治和战略层面的压力和考量时，往往更加容易同竞争对手外的国家合作。许多经贸合作难以达成的原因在于经济利益很难实现彻底共赢，而国内政治因素时常迫使国家坚持贸易保护主义立场。当结构性压力增

<sup>①</sup> 这部分方法论的讨论参见叶成城、唐世平：《基于因果机制的案例选择》，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9年第10期，第22～47页。

<sup>②</sup> 半负面案例的讨论参见周亦奇、唐世平：《“半负面案例比较”：北约与华约的命运为何不同？》，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8年第12期，第32～59页。

加时，大国之间在制度构建时会存在更多竞争性的地缘经济考量，<sup>①</sup> 这反而意味着能够通过不同领域间的利益交换达成妥协。在制度构建阶段，大国的支持是地区制度构建的基础，当地区内具备构建地区经济合作制度能力的国家数量从 1 个增加到 2 个时，就意味着霸权国逐渐无力阻止崛起国的制度构建，地区制度构建的路径就会更加多元化。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假说 1：在亚太地区，区域强国和霸权国的力量对比接近时，尽管大国会更加重视相对收益，但地区制度构建的路径也会更加多元化，因此，地区经济合作制度更容易构建成功。

第二，制度相容性。本文将亚太地区制度分为相容性程度高和相容性程度低两种类型。制度相容性较高意味着在地区经贸合作制度中，多数国家会试图利用其所控制的资源来增加公共物品的提供。<sup>②</sup> 在制度需求阶段，制度相容性主要考察地区内的合作制度是互利互惠的，还是排他性的。在制度的维持和深化过程中，制度相容性需要建立在互利共赢的基础上，如果地区制度成为大国盘剥他国的工具或者小国对大国的“搭便车”，从长期来看，这会损害制度的可持续性。同时，地区内制度构建是否存在共同的政治意愿或者相似的文化观念等因素，决定了制度是否能够被地区内大国主动遵守乃至内化。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假说 2：亚太地区经济合作制度的相容性越高，地区经济合作制度的构建越容易成功。

第三，霸权国对地区多边合作的战略关注度。本文以地区关注度高和地区关注度低来区分霸权国对亚太地区多边合作制度的战略关注度。在制度需求阶段，霸权国可以影响其他国家参与地区合作制度的意愿。当霸权国的战略关注度较高时，其会积极提供更多的公共物品来推动符合自身利益的多边经贸制度的发展；反之，霸权国会通过对地区内主要大国施压来阻碍地区合作的进程。在制度构建阶段，霸权国的战略关注度影响到地区内力量的对比。霸权国可以通过调整全球范围内的资源分配，在短时间内增强其在特定区域的影响力，例如，调遣更多区域外军事力量、强化同区域内盟友和伙伴的经济联系、更频繁的外事访问等。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当大国力量对比接近时，霸权国即使动用区域外的资源也难以影响到地区内的力量对比。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假说 3：在亚太地区，霸权国对于地区的战略关

---

① 叶成城：《从全球主义到现实主义：地缘经济学的发展和新趋势》，载《国外社会科学》2019 年第 1 期，第 118～128 页。

② 参见曼瑟·奥尔森：《权力与繁荣》，苏长和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1～13 页。

关注度越高，地区内合作就越容易达成，但随着其霸权优势的丧失，该变量对于地区制度构建的影响会逐渐减弱。

本文以冷战后亚太地区构建经贸合作制度的成败经验来检验上述理论假设，涉及四个不同时期的各类地区制度。下文将通过四个不同时期的四组地区制度进行配对比较，以此来检验上述假设，并在假设检验和案例研究的基础上获得新的发现和启示。

#### 四、单极霸权下的亚太地区合作制度

20 世纪 90 年代初，亚太地区结束了两极对抗的格局，各经济体之间日益密切的经贸关系成为推动区域经济活动的动力。从冷战结束到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前后，美国强大的军事和经济实力使其在亚太地区占据绝对优势，区域内没有任何国家可以同美国相匹敌，国际体系变成了一个“失去制衡的世界”。<sup>①</sup> 本文以 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作为时间分界线，将单极时代的亚太地区经济制度变迁过程分为两个阶段。

##### 1. EAEG 的失败和 APEC 的阶段性成功（1991~1997）

冷战结束后，美国将地区制度建设视作其实施亚太战略的一个重要部分，希望通过地区经贸合作加强其在亚太地区的政治经济影响力。美国领导的双边同盟体系成为地区安全的主导力量，这种“轴辐体系”是 20 世纪 90 年代亚太地区稳定的基石，即东亚国家/地区出口商品到美国，而美国出口安全到该地区。<sup>②</sup> 最初美国推进一体化的目的在于通过多边和双边方式融入东亚经济，分享东亚经济增长的成果。对于亚洲国家而言，地区合作制度给亚太地区各国提供了创建地区稳定繁荣的框架，提供了塑造议题和话语权的场所，这些制度需求使得区域内多数国家有足够的动力参与地区制度构建。但部分国家希望效仿北美和欧洲建立一个东亚地区性组织，以发出“亚洲的声音”，<sup>③</sup> 这导致在地区制度构建路径上与美国所倡导的亚太路径存在分歧。

---

<sup>①</sup> Stephen Brooks and William Wohlforth, *World out of Balanc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the Challenge of American Primac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

<sup>②</sup> John Ikenberry, "American Hegemony and East Asian Order", *Austral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58, No 3, 2004, p 353.

<sup>③</sup> Ishihara Shintaro and Mahathir Mohamad, *The Voice of Asia: Two Leaders Discuss the Coming Century*, Tokyo: Kodansha, 1995, p 44.

因此，亚太地区经济合作出现了两种竞争性路径，一是相对封闭的东亚路径，二是开放的亚太路径。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随着东亚地区经贸交往日益密切，出现了以东亚经济集团为代表的东亚主义合作需求。时任马来西亚财政部部长安瓦尔·易卜拉欣（Anwar Ibrahim）在 1993 年提出，希望东亚建立一个类似于北美自由贸易区的经济集团，从而可以同北美和欧洲进行平等谈判。<sup>①</sup> 然而，时任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穆罕默德（Datuk Seri Mahathir Bin Mohamad）等人所设想的制度安排缺乏足够的相容性，因为它损害了当时主要公共物品提供者美国的战略利益，显然美国不希望东亚建立一个将其排除在外的经济共同体。

在美国的反对下，EAEG 的制度构建很快遇到巨大的阻力。美国对“东亚经济共同体”这一概念的提出高度警惕，时任美国国务卿詹姆斯·贝克（James Baker）在一份致日本的备忘录中要求日本不要加入。<sup>②</sup> 贝克在其回忆录中提到，他竭尽所能去扼杀东亚经济集团，美国意识到如果没有日本的参与，东亚经济集团将无法对美国构成威胁。<sup>③</sup> 实际上，日本政府对“东亚经济共同体”的建立也持消极态度，因为日本更加依赖的是全球贸易而非区域贸易，日本经济联合会也对马哈蒂尔试图排除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做法表示不安。<sup>④</sup> 尽管得到了中国和新加坡的部分支持，但是马来西亚的诉求也招致了东盟内部的质疑，泰国希望先达成东盟内部合作后再讨论地区一体化问题，而印尼的苏哈托（Haji Mohammad Suharto）同马哈蒂尔存在竞争关系，反而转向支持美国。<sup>⑤</sup> 最终，由于遭受诸多阻力，马哈蒂尔提出建立东亚经济集团的设想未能实现，最终改名为东亚经济核心论坛（East Asia Economic Caucus）。

---

① Richard Higgott and Richard Stubbs, “Competing Conceptions of Economic Regionalism: APEC versus EAEC in the Asia Pacific”,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Vol 2, No 3, 1995, p 523.

② Johan Saravanamuttu, “Malaysia’s Foreign Policy in the Mahathir Period, 1981-1995: An Iconoclast Come to Rule”, *As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4, No 1, 1996, p 5.

③ James Baker, *The Politics of: War and Peace, 1989-1992*, New York: G. P. Putnam’s Sons, 1995, pp 610-611.

④ Linda Low, “The East Asian Economic Grouping”, *The Pacific Review*, Vol 4, No 4, 1991, pp 375-382; Richard Higgott and Richard Stubbs, “Competing Conceptions of Economic Regionalism: APEC versus EAEC in the Asia Pacific”, pp 526-527.

⑤ Takashi Terada, “Constructing an ‘East Asian’ Concept and Growing Regional Identity: from EAEC to ASEAN+3”, *The Pacific Review*, Vol 16, No 2, 2003, p 261.

相比 EAEG 的失败，在 20 世纪 90 年代的地区合作中，APEC 属于较为成功和产生实际效果的制度安排。APEC 所寻求的政治和经济整合并非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地区概念，而是一种新兴的话语建构。<sup>①</sup> APEC 以市场为主导的观念得到了各国/地区政府、企业和学者的支持，被认为是经济自由主义崛起的产物。<sup>②</sup> APEC 的出现并非仅仅是美国或者个别国家/地区为了自身利益而推动的，它满足了发展跨国界投资的基本需求，被称为“多边地区主义”（regiolateral）。<sup>③</sup> 对于美国而言，其目的在于通过加深与亚太地区的经济联系来推行西方式的民主价值观，实现以美国为核心的经济合作圈。对于日本、澳大利亚等国而言，它们希望通过加强地区合作来对冲北美和欧洲可能形成的贸易共同体，从而提高自身在后冷战体系中的地位。APEC 的发展同样符合中国的利益，因为中国需要通过贸易和投资自由化、投资贸易便利化和经济技术合作来提高其经济发展水平，而 APEC 为中国与美国等发达国家能够就一系列贸易问题进行讨论提供了场所，并且中国在 APEC 框架下的谈判压力要小于其他双边谈判。<sup>④</sup> 同时，APEC 的灵活性、自愿和非约束原则也符合多数其他东亚国家/地区的需求，因为在谈判中，成员能够在该框架下可以保护自身一些弱势和敏感领域。

在 APEC 制度构建过程中，既得到了霸权国的支持，同时各个成员国/地区也在谈判中实现了兼容性利益。在老布什政府后期，美国便积极推动这些制度的发展。1991 年 11 月，在美国的支持下，APEC 第三次部长级会议通过了《汉城宣言》，提出 APEC 的宗旨是促进地区内的经贸往来与相互依赖。<sup>⑤</sup> 此后美国对 APEC 寄予厚望，克林顿政府对该制度建设的积极性甚至高于多数亚洲国家。1993 年 11 月，首届亚太经合组织领袖会议在西雅图召

---

① Arif Dirlik, “The Asia-Pacific Idea: Reality and Representation in the Invention of a Regional Structure”, *Journal of World History*, Vol 3, No 1, 1992, p 56.

② Richard Higgott and Richard Stubbs, “Competing Conceptions of Economic Regionalism: APEC versus EAEC in the Asia Pacific”, pp 518-519.

③ Wendy Dobson and Lee Tsao Yuan, “APEC: Co-operation Amidst Diversity”, *ASEAN Economic Bulletin*, Vol 10, No 3, 1994, p 231.

④ Lok Sang Ho and John Wong, *APEC and the Rise of China: An Introduction*, London: 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Press, 2011, p 4; Ariff Mohamed, *APEC and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1998, pp 104-123.

⑤ 参见中国商务部网站, <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bg/200207/20020700033052.shtml>。

开,这标志着 APEC 制度构建的进一步完善,此后形成了定期召开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传统。当年作为东道主的克林顿政府提出了“新太平洋共同体”的战略构想,建议将 APEC 这个缩写中的“C”由“合作组织”(Cooperation)改写成“共同体”(Community)。<sup>①</sup> 尽管该倡议由于多数成员的反对而没有成功,但是也因此确定了不同于其他地区的“东盟方式”,即一种非强制性的松散制度,避免了因制度构建给成员带来过多的硬约束。

在此背景下,APEC 谈判进展顺利,实现了制度的维持与深化。1994 年,APEC 首脑会议通过了《茂物宣言》,在亚太地区设立了实行自由和开放贸易投资的“茂物目标”,提出各成员要通过进一步减少贸易投资壁垒以及促进商品、服务贸易和资本的自由流动来实现这一目标。<sup>②</sup> 同时,《茂物宣言》强调,为避免因将 APEC 建成内向贸易集团而损害全球自由贸易,对于非 APEC 成员要采取一视同仁的态度。<sup>③</sup> APEC 领导人会议在此后两年相继通过了《大阪行动议程》和《马尼拉行动计划》,提出成员自行决定贸易自由化的时间表和优先顺序,朝“茂物目标”迈出了重要一步。这一阶段确立了 APEC 未来的目标和日程表,各方都对 APEC 的功能寄予厚望,使得 APEC 的声望达到了顶峰。

总体而言,以 APEC 为代表的开放型地区主义成为亚太地区经贸合作的开端,其优势在于它体现了各方利益的平衡,为在复杂的亚太局势下进行地区合作和一体化进程提供了可能性,因而被称为“新一轮地区主义的浪潮”。<sup>④</sup> 而构建东亚经济集团失败的原因在于,北美和澳大利亚不可能允许一个将其排除在外的非相容性制度的出现,同时,倡导构建东亚经济集团的国家又缺乏足够实力来抗衡源自霸权国的压力。因此在这个时期内,东亚国家试图建立一个排除美国的封闭型地区主义制度的尝试注定失败。

## 2. APEC 的停滞与“10+3”的失败(1998~2008)

1997~2001 年间是亚太地区合作制度变迁的重要转折,亚洲金融危机和“九一一”恐怖袭击这两个重大事件改变了亚太地区经贸合作制度变迁的方

① 王嵎生:《亲历 APEC 与时代的变迁》,世界知识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80 页。

② 张献:《APEC 的国际经济组织模式研究》,法律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3 页。

③ Fred Bergsten,“Open Regionalism”,*The World Economy*, Vol 20, No 5, 1997, p. 550.

④ Edward D. Mansfield and Helen V. Milner,“The New Wave of Regionalism”,*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3, No 3, 1999, pp. 589-627.

向。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对待亚洲金融危机和墨西哥金融危机的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反差，这让东亚国家意识到美国缺乏足够的利益动机来帮助各国渡过危机。时任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将美国对泰国金融危机的袖手旁观称为是“一个严重的错误”。<sup>①</sup> 与中国在危机中的建设性行为形成鲜明反差，由美国控制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实施的政策引发了东亚许多国家的不满，从而推动了东亚地区主义兴起的浪潮。2001年“九一一”事件后，美国对于亚太地区的战略关注度进一步下降。小布什政府认定最主要的威胁来自试图获得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敌对政权和恐怖组织。<sup>②</sup> 美国的战略视角转向了中东地区，对亚太地区合作的关注度和积极性大幅下降，在此背景下，无论是基于东亚路径还是亚太路径的地区经贸制度建设，它们都遭受了挫折。

APEC为代表的亚太路径由于缺乏霸权国的支持而出现发展停滞，并存在“泛安全化”的趋势，从而损害了APEC以经贸合作为导向的制度需求。由于美国的消极态度，APEC在部门自愿提前自由化谈判陷入僵局时，将其提交给世界贸易组织处理；APEC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应对同样无能为力，只能求助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些都严重损害了APEC的名声和信誉，令各国意识到APEC缺乏足够的行动能力。<sup>③</sup> 2003年，时任美国贸易代表罗伯特·佐立克（Robert Zoellick）拒绝了泰国将实现茂物会议目标的时间从2020年提前到2015年的建议，并对澳大利亚、新加坡和新西兰支持的构建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的设想反应冷淡。<sup>④</sup> 更为糟糕的是，美国政府将APEC当作阐释其政策与观点的场所，在各类经济制度中加入了安全议题，其后果是让APEC逐渐偏离了原来的方向。<sup>⑤</sup> 因此在1998～2008年间，

---

① Takashi Terada, “Constructing an ‘East Asian’ Concept and Growing Regional Identity: From EAEC to ASEAN+3”, p. 265.

② *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Report*, U. S. Department of Defense, 2006, pp. 3-32.

③ John Ravenhill, “APEC Adrift: Implications for Economic Regionalism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The Pacific Review*, Vol. 13, No. 2, 2000, p. 325; Douglas Webber, “Two Funerals and A Wedding? The Ups and Downs of Regionalism in East Asia and Asia-Pacific After the Asian Crisis”, *The Pacific Review*, Vol. 14, No. 3, 2010, pp. 356-358.

④ 宋伟：《试论美国对亚太区域合作的战略目标和政策限度》，载《当代亚太》2010年第5期，第12页。

⑤ Diane Mauzy and Brian Job, “US Policy in Southeast Asia: Limited Re-Engagement after Years of Benign Neglect”, *Asian Survey*, Vol. 47, No. 4, 2007, pp. 622-641; Ian Taylor, “APEC, Globalization, and 9/11: The Debate on what Constitutes Asian Regionalism”, *Critical Asian Studies*, Vol. 36, No. 3, 2004, p. 470.

APEC的发展总体处于停滞状态,直到2005年之后,APEC的议题才重新回到茂物目标。尽管2005年的APEC首脑峰会通过了具有象征性意义的《釜山路线图》,但是APEC在纷繁复杂的亚太地区制度网络中的地位已经大幅下降。

小布什政府的单边主义做法损害了以亚太为基础的多边主义路径,也在一定程度上鼓励了以“10+3”为代表的东亚地区主义路径。<sup>①</sup>东亚各国对APEC的失望和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前后的反思也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对于“10+3”的制度需求。亚洲金融危机拉大了东北亚和东南亚的发展差距,东盟国家急于拉近和中日韩的关系,希望能够从东北亚国家的发展中获益,借助东亚一体化增强在全球经济和国际组织中的影响力。<sup>②</sup>同时亚洲金融危机也给东亚各国和地区带来了巨大的冲击,通过区域经济的整合符合东亚国家的整体利益,而应对类似危机的最好方案是“10+3”框架。

“10+3”框架的构想始于1997年首次东盟与中日韩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1999年第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中,发表了《东亚合作联合声明》,这标志着东亚共同体制度构建的开始。最初“10+3”的制度构建以应对金融危机为目标,2000年各国财政部部长在清迈会议上决定统一建立共同外汇储备基金以帮助面临外汇短缺的国家渡过难关。《清迈倡议》之后,“10+3”发展包括了一系列双边货币互换协议等三个轨道的规制。<sup>③</sup>以此为契机,东盟和中日韩在2000年建立了正式的协商制度,并在2002年签订了《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决定到2010年建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2003年巴厘岛会议中,中日韩三国发表了《中日韩推进三方合作联合宣言》,呼吁加强经贸、投资、旅游、科技等领域的合作,并通过“10+3”等多种区域合作形式加强东亚一体化进程。<sup>④</sup>

在推动建设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之后,中国一度对“10+3”的前景非常乐观。中国推动制度构建的设想是希望与日本一同打造东亚自贸区,以

---

<sup>①</sup> Mark Beeson, “American Hegemony and Regionalism: The Rise of East Asia and the End of the Asia-Pacific”, *Geopolitics*, Vol. 11, No. 4, 2007, pp. 541-560.

<sup>②</sup> Douglas Webber, “Two Funerals and a Wedding? The Ups and Downs of Regionalism in East Asia and Asia-Pacific after the Asian Crisis”, p. 358.

<sup>③</sup> Richard Stubbs, “ASEAN Plus Three: Emerging East Asian Regionalism?”, *Asian Survey*, Vol. 42, No. 3, 2002, pp. 449-450.

<sup>④</sup> 《中日韩推进三方合作联合宣言》,人民网, <http://www.people.com.cn/GB/shizheng/1024/2121692.html>.

当前“10+3”的对话框架为基础，最终形成一个地区性组织。<sup>①</sup>然而，一旦中国试图直接主导部分地区机制时，必然引起美国及其盟友的疑虑。美国反对任何地区性大国主导东亚合作，尤其是在 APEC 衰落之后，中国所推动的东亚峰会（East Asia Summit, EAS）就被美国认为是“正在构筑一个试图将美国排除在外而进行对话的机构和开始新的合作”。<sup>②</sup>日本、澳大利亚和印度等国同样担忧，如果中国获得过多规则制定权就会打破美国构造的规则体系，而东盟也担忧中国崛起会打破过去东盟主导的“小球带动大球”的方式，希望吸纳更多新成员来制衡中国并维持其领导作用。在 2005~2008 年间，东亚地区合作进一步扩大化，在东盟推动下邀请印度、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参与东亚峰会，由于“东盟+X”的制度安排在制度尚未深化之前又引入新成员，即从“10+3”扩展到“10+6”，这意味着地区内各大国之间将更难达成共识，从而使得该制度安排失去了进一步深化建立成东亚共同体的可能性。

这一时期由于美国对亚太的战略关注度下降，而地区内大国也缺乏足够的能力促成深度合作，因此 APEC 的制度构建几乎处于停滞状态。由于美国最初并不认为代表当时东亚路径的“10+3”会威胁其战略利益，因而对此采取了“忽略性接触”的态度。<sup>③</sup>因此，“10+3”尽管缺乏足够制度兼容性，最初仍可以取得部分进展。然而，由于地区内大国都不放心彼此获得对一体化议程的主导权，仅凭经济和金融地区主义无法减轻植根于现实主义安全观的深刻焦虑，从而使经济合作的前景黯淡，最终带来的后果是形成了制度化水平较低但数量众多的制度网络，即所谓的“面条碗效应”。<sup>④</sup>

### 3. 小结

如表 2 所示，在美国仍然处于绝对优势时，亚太地区的一体化进程很大程度上受到了霸权国战略关注度的影响。在美国致力于推进亚太地区合作时，早期的 APEC 取得部分阶段性成果，而试图将美国排除在外的东亚路径则很快失败；当

---

① Zhang Yunling, “Emerging New East Asian Regionalism”, *Asia-Pacific Review*, Vol 12, No 1, 2005, p. 58.

② 孙学峰：《中国崛起困境：理论思考与战略选择》，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187 页。

③ Michael Wesley, “The Dog that didn’t Bark: The Bush Administration and East Asian Regionalism”, in Mark Beeson ed., *Bush and Asia: America’s Evolving Relations with East Asia*, New York: Routledge, 2006, pp. 72-74.

④ 参见 Richard Baldwin, “Managing the Noodle Bowl: The Fragility of East Asian Regionalism”, *The Singapore Economic Review*, Vol 53, No 3, 2008, p. 465.

美国对亚太的战略关注度开始下降时，无论制度安排是否具有较高的兼容性，最终都由于缺乏足够的需求或没有大国的积极支持而难以得到有效的推进。

表 2 冷战结束后早期亚太地区经贸制度变迁

自变量		大国力量对比悬殊			
		霸权国战略关注度高 (1989~1997)		霸权国战略关注度低 (1997~2008)	
		制度兼容性低	制度兼容性高	制度兼容性低	制度兼容性高
因变量的阶段	制度需求	√	√	√	×
	制度构建	×	√	√	×
	制度深化	×	√	×	×
案例		EAEG 失败	APEC 阶段性成功	“10+3” 仅取得有限成果	APEC 发展停滞

注：√表示该阶段获得成功，×表示该阶段未获得成功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五、后金融危机时代的亚太地区合作

2008 年是国际政治的重要分水岭，次贷危机沉重地打击了美国经济，美国经济陷入了负增长，2008 年和 2009 年的增长率分别为-0.29%和-2.80%。<sup>①</sup> 1999 年到 2008 年的 10 年间，中国经济的年均增长率分别达到 9.75%，大大高于同期世界平均的 3.07%和美国的 2.58%。<sup>②</sup> 这一时期内，中美之间的实力逐步接近一个数量级，<sup>③</sup> 从而在地区内形成一种“不对称的两极格局”。<sup>④</sup> 在此背景之下，亚太地区的制度博弈进入新阶段。

1. TPP 的推进与 RECP 谈判的开启（2009~2016）

对大国地位衰落的担忧和对现行制度安排的不满增加了美国参与地区经

① 数据来自世界银行官网，<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NY.GDP.MKTP.KD.ZG?locations=US>。

② 张幼文：《“金砖四国”的由来及其国际经济合作》，载《求是》2010 年第 8 期，第 56~58 页。

③ 阎学通、张旗编：《道义现实主义与中国的崛起战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82~91 页。

④ Liu Ming, “Northeast Asia Order after WWII: Continuity, Compliance, Power-Transition and Challenges”, *The Korean Journal of Defense Analysis*, Vol 27, No 2, 2015, pp. 163-186.

贸合作的制度需求。美国在全世界建立的国际制度网络，极大地加强了其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和特权，美国国家利益的实现也高度敏感地依赖于其对国际规则制定权的主导，以及这些规则适用范围的扩展。<sup>①</sup>但随着中国等新兴国家的兴起，战后美国构建的开放、多边的国际规则体系的运转效率越来越低，美国控制国际交易网络和交换渠道的成本也不断上升。<sup>②</sup>为扭转在东亚经济中的不利地位，美国在亚太地区经济制度中的战略发生了较大变化，在贸易、投资和金融等核心领域，美国主导国际组织和规则的主要形式由开放的“全球模式”，转变为半封闭的“俱乐部模式”，由基于多元化的鼓励加入，转变为根据美国的标准和需要有条件地准入。<sup>③</sup>

TPP 则是美国试图实现这一目标的核心战略支柱。TPP 最初由新西兰、新加坡、智利和文莱四国发起，于 2005 年签订贸易协定（被称作 P4），旨在形成一个高标准协定而成为亚太地区经济合作的模板。<sup>④</sup>由于四国体量较小，最初 P4 的影响力有限，直到美国加入其中，试图将其打造成高标准的贸易合作俱乐部。单就经济效益而言，TPP 对于美国经济效益的作用并不显著，这种俱乐部式的地区合作更加注重形成一种“高规格、高门槛”的制度安排，包括强调国内影响贸易和投资的政策规则。这些规则在谈判初期可以有选择性地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排斥在外，使其受到排他性冲击。<sup>⑤</sup>

美国推动 TPP 的制度构建不仅仅是依靠经济的吸引力，更重要的是通过将战略资源更多地转向亚太，借助于地缘政治优势来推动制度发展。2008 年 11 月奥巴马上台后，美国的战略重心开始从中东和反恐问题逐渐转向亚太地区，开始寻求加强同亚太盟国和伙伴之间的关系。<sup>⑥</sup>奥巴马政府高调展示全方位介入亚太事务的政治意愿，进一步强化与亚太国家的政治与军事联

① 高程：《新帝国体系中的制度霸权与治理路径》，载《教学与研究》2012 年第 5 期，第 58 页。

② 高程：《从规则视角看美国重构国际秩序的战略调整》，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 年第 12 期，第 87 页。

③ 同上，第 81 页。

④ Meredith Kolsky Lewis, “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New Paradigm or Wolf in Sheep’s Clothing?”, *Boston College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Review*, Vol 34, No 1, 2011, pp 32-33.

⑤ Mireya Solis, “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Can the United States Lead the Way in Asia-Pacific Integration?”, *Pacific Focus*, Vol 27, No 3, 2012, pp 319-341.

⑥ Barack Obama, “Renewing American Leadership”, *Foreign Affairs*, Vol 86, No 4, 2007, pp 12-14; *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Report*, U. S. Department of Defense, 2010, p 60.

系,同时从政治、安全等基本权力结构的层面强力支撑美国贸易权力的重构。<sup>①</sup>在此背景下,美国投入巨大的成本拉拢其盟友和伙伴,通过双边谈判和自贸区的形式,来提高其高附加值和高科技产品的竞争力,以改变在同中国竞争中的相对收益来维持美国的霸权。<sup>②</sup>奥巴马在2009年11月访问东京时,高调宣布参与TPP谈判,并强调要建立一个高标准、多领域的亚太区域一体化协定。在2010年美国启动TPP谈判后,2011年,随着日本、墨西哥和加拿大加入TPP谈判,使TPP有望成为地区内最具影响力的贸易组织。

对于美国而言,TPP的进一步发展与制度化需要地区内大国尤其是日本的支持,日本是美国推动TPP框架的关键。在中日关系恶化的背景下,安倍政府对于TPP也表现出浓厚的兴趣,认为加入TPP既能够获得经济收益和规则制定权的先机,又能够实现助美抑华的战略目标,是安倍经济外交的“一石多鸟”之举。<sup>③</sup>过去贸易谈判陷入僵持的重要原因是因为日本农业利益集团的阻力,但当安倍政府感受到来自中国崛起的压力时,国内的阻力就显得微不足道,其便会极力推动。因此,TPP作为有效应对中国对地区影响力增长的手段,积极推动TPP对日美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安倍政府为此不惜牺牲农业部门的利益,尽管招致国内巨大的反对,安倍仍表示打算独自承担责任,决定参加谈判。<sup>④</sup>2013年3月15日,安倍政府宣布加入TPP谈判。2015年10月5日,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等12个国家已成功结束谈判,达成TPP贸易协定,并于2016年2月4日正式签署协议。在此期间,TPP的前景曾被看好,并认为TPP已经接近于获得成功。<sup>⑤</sup>

为应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带来的冲击以及来自TPP的压力,东亚地区再度产生了经济一体化的需求,这一时期的主要代表性制度安排是构建RCEP。RCEP旨在解决“面条碗效应”所带来的混乱。东亚经济合作往往

---

① 舒建中:《美国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贸易权力的重构》,载《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14年第6期,第42页。

② Ashley Tellis, “Balancing without Containment: A US Strategy for Confronting China’s Rise”,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 36, No 4, 2013, p 14.

③ 姜跃春:《TPP新特征与日本加入谈判的影响》,载《亚太经济》2014年第2期,第123页。

④ 《安倍晋三称决定参加TPP谈判将独自承担责任》,中新网, <http://www.chinanews.com/gj/2013/02-26/4597508.shtml>。

⑤ 参见王灵桂:《TPP为什么陨落:全球智库论TPP、“一带一路”和亚投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1~2页。

以不同类型的双边协议为主，大量基于东盟的贸易协定提高了企业的交易成本，同时也降低了效率。<sup>①</sup> RCEP 的制度兼容性在于其更倾向于采取折中路线。从具体条款来看，RCEP 的严格程度介于 TPP 和传统的贸易协定之间：一方面，它没有涉及较为敏感的劳工标准、政府采购等问题；<sup>②</sup> 另一方面，它提出将市场准入、规则和合作作为三大支柱，参照现有“东盟+1”自由贸易协定，考虑成员的不同发展水平，包含设立特殊和差别待遇条款在内的适当形式的灵活性，并给予最不发达的东盟国家额外的灵活性。<sup>③</sup> 从一体化的路径选择来看，RCEP 是过去中日主张的两种东亚主义路线的折中。在 1997 年后的东亚合作路径中，中国主张“10+3”的合作路径，而日本则更加倾向于将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印度吸收进来。RCEP 则坚持以东盟为中心，在自愿的基础上不需要所有的谈判国都最终参加协议，因此相比过去的“10+6”，RCEP 更具有弹性和兼容性。此外，奥巴马政府并不反对东盟主导的 RCEP 发展。在 2012 年首届东盟—美国经贸部长会议召开后，时任美国贸易代表罗恩·柯克（Ron Kirk）表示，亚太地区有足够的空间让 TPP 和 RCEP 这两个协定并存，并认为两者是互补的而不一定是竞争性的。<sup>④</sup> 因此，相对较低的目标和坚持过去的“东盟+X”模式，使得 RCEP 被认为符合所有亚洲经济体的利益，是最快速地和最低成本地解决过去“面条碗”问题的工具。<sup>⑤</sup>

RCEP 的制度构建以过去东盟分别同中国、日本、澳大利亚与新西兰、韩国和印度达成的 5 个自贸协议为基础。RCEP 的构想最初在 2011 年东盟领导人会议上提出，产生了组建 RCEP 的草案并被东盟批准。2012 年，东盟

---

① Sanchita Basu Das, “The 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New Paradigm or Old Wine in a New Bottle”, *Asian-Pacific Economic Literature*, Vol 20, No 2, 2015, pp. 69-70.

② Jean-Raphaël Chaponnière and Marc Lautier, “By Chance or by Virtue? The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Process in Southeast Asia”, in Bruno Jetin and Mia Mikic eds., *ASEAN Economic Community A Model for Asia-Wide Regional Integration?* New York: Macmillan, 2016, p. 48.

③ 《驱动经济一体化促进包容性发展——〈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谈判领导人联合声明》，中国自由贸易区服务网，[http://fta.mofcom.gov.cn/article/zhengwugk/201711/36157\\_1.html](http://fta.mofcom.gov.cn/article/zhengwugk/201711/36157_1.html)。

④ 许宁宁：《RCEP：东盟主导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网站，<http://www.cafta.org.cn/show.php?contentid=65652>。

⑤ 参见 Jeffrey D. Wilson, “Mega-Regional Trade Deals in the Asia-Pacific: Choosing between the TPP and RCEP?”,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sia*, Vol 45, No 2, 2015, pp. 348-349.

和其他六国在经济部长会议上同意组建 RCEP, 正式启动 RCEP 的谈判进程。最初谈判启动后的进展较为缓慢, 仍集中在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领域, 直到 2015 年才加入了投资、经济技术合作、知识产权等领域的谈判合作。<sup>①</sup>但随着 2015 年底美国推进的 TPP 取得部分成果后, RCEP 各国为避免被边缘化开始加速贸易谈判。RCEP 的发展得到了东亚主要大国的支持, 尽管是以东盟为核心并非中国所主导, 但是由于 TPP 等外在压力, 中国对 RCEP 一直持积极态度。李克强总理在 2015 年 11 月的“10+3”领导人会议上提出倡议, 强调区域经济融合发展是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 中方愿与各方共同努力, 建成世界上具活力的自贸区。<sup>②</sup>与此同时, 由于 TPP 的进展出现一定变化, 日本担心中国在 RCEP 中发挥主导作用, 安倍晋三重新表示了对 RCEP 的重视, 提到如果 TPP 没有取得任何进展, 将会转向 RCEP。<sup>③</sup>因此, 从 2016 年起, RCEP 的谈判开始加速推进, 至 2019 年 11 月, RCEP 的 15 个成员国的谈判已经进入尾声, 预计将在 2020 年签署至少部分协议。<sup>④</sup>

总之, 这一时期的地区合作出现了多元化路径, 随着大国力量接近, 霸权国的尽力推动或许使具有较高相容性的地区合作制度可以获得成功。美国利用自身地缘政治经济优势所推动的 TPP 接近于成功, 而 RCEP 的谈判同样出现曙光。这两类不完全相斥的地区合作制度之间的并行发展, 使得地区合作中出现了“自贸区竞争”乃至“制度之战”的新局面。<sup>⑤</sup>

## 2. TPP 到 CPTPP 的转型与亚投行的建立 (2016~2019)

2016 年以来, 世界范围内出现反全球化浪潮, 同年 6 月 23 日的英国脱欧公投首先开启了区域一体化的回潮。2016 年年底, 美国反建制派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 (Donald Trump) 当选总统, 美国对亚太地区的战略关注度有所下降, 亚太地区合作制度进入了新纪元。新一届美国政府坚持“美国优先”的理

---

① 庄芮、林佳欣:《RCEP: 进展、挑战与前景》, 载《东南亚研究》2018 年第 4 期, 第 87~102 页。

② 《李克强为何力挺 RCEP 谈判?》, 中央政府门户网站, [http://www.gov.cn/zhengce/2015-11/23/content\\_2970476.htm](http://www.gov.cn/zhengce/2015-11/23/content_2970476.htm)。

③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搞不成 TPP 只能考虑 RCEP》, 观察者网, <https://news.china.com/international/1000/20161115/23887027.html>。

④ 《RCEP 谈判取得重大突破致力于 2020 年签署协议》, 新浪网, <http://finance.sina.com.cn/world/gjcj/2019-11-05/doc-iicezuev7214035.shtml>。

⑤ 李巍:《制度之战: 战略竞争时代的中美关系》,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7 年版; 李巍:《现实制度主义与中美自贸区竞争》, 载《当代亚太》2016 年第 3 期, 第 4~34 页。

念，在经济合作制度中带有明显的经济民族主义色彩，其当选也是新一轮反全球化浪潮在美国的表现，即不满意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给美国中产带来的负面效应。<sup>①</sup>

美国国内政治的剧变迅速降低了对 TPP 的制度需求。特朗普政府比奥巴马政府更加看重贸易逆差问题，在对外贸易等方面多次强调中日等国的贸易逆差问题。在 2018 年 1 月 30 日的《国情咨文》中，特朗普要求制造业返回美国、减少对外能源依赖，鼓励在美国本土投资、提出振兴美国基础设施等。<sup>②</sup> 特朗普政府以“公平贸易”为由，制造同主要合作伙伴的贸易摩擦，频繁认定各国对美国经贸往来属于“不公平贸易”，对北美自由贸易区和 TPP 等多边经贸合作制度持消极和否定态度。尽管日本极力劝阻，但是特朗普在上任伊始就直接退出 TPP，从而使 TPP 的发展迅速陷入低潮。美国退出后，TPP 剩余 11 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占全球的比重从 40% 下降至 13%，贸易额占全球的比重由 25% 下降至 15%，TPP 的影响力显著降低。<sup>③</sup> TPP 规定，已经完成国内立法批准 TPP 条款的国家的 GDP 总量需要达到最初缔约方的 85% 以上，而美国的 GDP 占 TPP 成员国 GDP 总数的半数以上，<sup>④</sup> 故而美国的退出使 TPP 的发展遭受重挫，最终由剩余的 11 国重新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并改名为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omprehensive and Progressive Agreement for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CPTPP）。

在美国对地区合作兴趣下降的同时，中国所主导的地区制度构建开始出现。中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以来，一直保持经济高速增长，经济体量超越主要的发达国家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大商品贸易国。2008 年金融危机后，中国经历长时间的高速增长，其影响力日益增强，而中国的改革开放也进入了新阶段，逐渐从“引进来”到“走出去”。习近平主席在 2013 年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包括 5 个方面的区域合作思想：加强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和民心相通。<sup>⑤</sup> 在“一带一路”

① 吴心伯：《特朗普执政与中美关系走向》，载《国际问题研究》2017 年第 2 期，第 19 页。

② Nikolas Gvosdev, “Trump Unveiled these Key Geoeconomic Plans in His State of the Union”, *National Interest*, <https://www.fpri.org/article/2018/02/trump-unveiled-key-geoeconomic-plans-state-union/>.

③ 袁波：《CPTPP 的主要特点、影响及对策建议》，载《国际经济合作》2018 年第 12 期，第 22 页。

④ 苏庆义：《中国是否应该加入 CPTPP？》，载《国际经济评论》2019 年第 4 期，第 109 页。

⑤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外文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289～290 页。

倡议框架下，中国开始主动为地区合作贡献新思想和公共物品。

在此背景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AIIB, 简称亚投行）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和亚洲发展中国家有着共同的制度需求。亚洲是当今世界上最具经济活力和增长潜力的地区，拥有全球近一半的人口，但因建设资金有限，一些国家的基础设施严重不足，而现有多边机构却不能为亚洲各国提供基建所需的资金，从而限制了该区域的经济的发展。<sup>①</sup> 由于中国拥有相对较多的资本，一旦中国参与亚投行资助的基础设施项目，有助于消化中国国内制造业、基础设施建设和相关行业的过剩产能。<sup>②</sup> 同时，亚投行是中国增强地区地缘经济影响力、增强“一带一路”倡议国际影响力的重要金融工具。亚投行也为中国资本在其他国家的投资提供了渠道，从而实现了中国和亚洲国家之间的互利共赢。

在亚投行构建开始就出现了大国之间的博弈。亚投行最初的设想源于 2013 年 10 月习近平主席在印尼国会发表演讲时所提出的“计利当计天下利”的思想，提出中国愿意支持东盟国家开展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sup>③</sup> 尝试建立一个专门从事基础设施建设的银行，从而为亚洲基础设施项目额外提供资金支持。中国的倡议很快得到了亚洲各国的响应。2014 年 10 月，印度、新加坡、马来西亚等 21 个创始成员在北京签约备忘录，共同决定筹建亚投行。亚投行作为“一带一路”的重要支点，最初被认为是对现有多边开发银行的挑战。美国将亚投行视为中国向亚洲投射经济影响力的工具，担心中国借此将挑战西方主导的国际金融秩序，因此美国试图通过外交压力劝阻其盟友参加。虽然美国的阻挠一度让其亚洲盟友在参与亚投行问题上出现摇摆——韩国和澳大利亚最初在美国的游说之下缺席，但由于中国经济实力日渐增强，美国最终无法阻止澳大利亚和韩国等盟友参与亚投行。<sup>④</sup> 2016 年初，亚投行在北京举行开业仪式暨理事会和董事会成立大会，这标志着亚投行的筹建取得了实质性进展。

亚投行的维持与深化依靠的是中国同成员之间的互利共赢，在此理念

---

① 《亚投行路线图猜想》，载《国际金融报》2014 年 11 月 24 日，第 24 版。

② Hong Yu, “Motivation Behind China’s ‘One Belt, One Road’ Initiatives and Establishment of the 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 26, No 105, 2017, pp 7-9.

③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第 292~295 页。

④ Mike Callaghan and Paul Hubbard, “The 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Multilateralism on the Silk Road”, *China Economic Journal*, Vol 9, No 2, 2016, pp 12-14.

下，亚投行的发展从最初的地缘经济战略工具，逐渐转为大国合作的平台。2015 年初，中国倡导的亚投行面临着重要选择：中国究竟是创建一个仅限于亚洲地区内的小型组织来挑战现有多边银行的新机构，还是通过与西方国家协商来创建一个更大的、全球范围内合法的机构。<sup>①</sup> 中国最终选择了后者。在亚投行具体设计上，尤其是在决策程序和贷款政策方面，中国撤回了许多争议性提议，并将控制权交给全体成员。<sup>②</sup> 中国这一决策带来的结果是亚投行进一步得到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认可。2015 年后，亚投行的成员迅速增加，从 2016 年一共有 57 个成员，至今已增至 102 个成员。这些成员中不乏大量区域外的参与者，这也为亚投行的转型和进一步提升其制度兼容性带来契机。中国通过兼顾发达经济体的利益使得亚投行成为具有更加广泛基础的国际机构，<sup>③</sup> 这一转变显示出中国在构建经济合作制度中的灵活性，即通过与合作伙伴协商的方式来提升其在全球经济中的领导地位。

表 3 后金融危机时代的亚太地区制度变迁

自变量		大国力量对比接近			
		霸权国战略关注度高 (2009~2016)		霸权国战略关注度低 (2016~2018)	
		制度兼容性低	制度兼容性高	制度兼容性低	制度兼容性高
因变量的阶段	制度需求	✓	✓	×	✓
	制度构建	✓	*	×	✓
	制度深化	N/A	*	×	✓
案例		TPP 接近成功	RCEP (推进中)	TPP 发展受挫	AiIB 成功建立

注：N/A 表示该阶段仅存在于反事实思考，\* 表示正在谈判推进中尚未达成相关促进制度深化的协议，✓ 表示该阶段获得成功，× 表示该阶段未获得成功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总体而言，这个时期在地区层面内，中美力量逐步接近。美国领导的

① Jeffrey Wilson, "The Evolution of China's 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From a Revisionist to Status-Seeking Agenda",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Asia-Pacific*, Vol. 19, No. 1, 2017, p. 169.

② Ibid., pp. 151-152.

③ 数据来自亚投行网站，参见 <https://www.aiib.org/en/about-aiib/governance/members-of-bank/index.html>。

TPP 具有较大的权力失衡,通常还伴随着强制行为,而中国倡导的自贸区谈判,因为更加包容,成员之间的地位更加均衡,更容易照顾到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sup>①</sup> 尽管美国试图阻止亚投行的制度建设,最终由于中国实力的增长和对制度兼容性原则的坚持而未能成功;相反,由于特朗普政府的消极态度,失去美国支持的 TPP 很快遭受挫折,最终转向了制度兼容性相对较强的 CPTPP。

### 3. 小结

在地区层面内,当中美力量对比相接近时,霸权国在地区合作中开始更加重视相对收益。美国推动 TPP 更多的是基于地缘经济战略而非兼容性利益。中俄韩等亚太地区主要经济体都被排除在外,甚至作为发达经济体的日本在签署农业协议时都面临较大的困难。<sup>②</sup> 缺乏兼容性是 TPP 脆弱的来源,如表 3 所示,TPP 发展受到霸权国战略关注度的强烈影响。在 2005 年创立之初仅为 4 个小国之间的协议,在美国加入之后俨然成为当时最重要的地区经贸合作制度,而在美国退出后则前景却较为黯淡。一个简单的反事实思考就是,如果美国没有退出 TPP 或者很快重回谈判,TPP 的发展就很可能成功。RCEP 和 AIIB 并非霸权国所主导,因此对制度兼容性要求更高,但随着亚太地区中美两国实力的接近,霸权国无法像过去那样阻挠东亚地区的经济合作,AIIB 的成功也检验了这一观点。

## 六、构建亚太地区多边经贸合作制度成败的逻辑

前文探讨了地区合作制度演变的逻辑,下文将从类型学和历史制度主义制度变迁理论的视角出发,重新审视亚太地区经济合作制度的变迁历程,根据假设检验的结果来察看原先的理论。目前地区合作制度演变的趋势仍然没有定型,因而在理论进行检验之后,本文以此为基础来展望和预测亚太地区合作制度的未来。

---

① 李巍:《制度之战:战略竞争时代的中美关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174 页。

② 参见 Christopher Dent, "Paths Ahead for East Asia and Asia-Pacific Regionalism",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89, No 4, 2013, pp. 979-980.

表 4 地区经贸合作制度成败的因素分析

	大国力量对比悬殊		大国力量对比接近	
	制度兼容性低	制度兼容性高	制度兼容性低	制度兼容性高
霸权国战略 关注度高	失败 EAEG	成功 APEC (1991~1997)	接近成功 TPP (2009~2016)	推进中 RCEP
霸权国战略 关注度低	失败 “10+3”	失败 APEC (1997~2008)	失败 TPP (2016~2018)	成功 AIIB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一方面，从类型学的视角来看，上述案例对比通过了前文的假设检验：即地区大国力量对比接近时，区域合作的路径会更加多元化、制度兼容性更强；霸权国对于地区多边主义关注度更高时，区域合作更容易成功。如表 4 所示，在大国力量对比悬殊时，霸权关注度高和制度兼容性是地区制度成功的必要条件。如本文案例所述，只有 APEC（1991~1997）成功了，其他的制度构建尝试都失败了。在大国力量对比接近时，由于权力结构的变化，地区制度构建的逻辑发生了变化，其路径也变得更为多元化。一方面，出于制衡崛起国的目的，霸权国花费大量资源构建兼容性较低的制度（TPP），但是这类低兼容性制度是不稳定的，一旦霸权国对地区的战略关注度降低，这个制度就容易失败。另一方面，兼容性高但霸权关注度低的制度（AIIB）依然会成功，另一个大国（中国）能够承担领导者和公共产品提供的角色。冷战后亚太地区经贸合作制度的成功条件可以用布尔代数可以表述为：大国力量对比悬殊 \* 霸权国战略关注高 \* 制度兼容性高 + 大国力量对比接近 \* （制度兼容性高 \* 霸权国战略关注低 + 制度兼容性低 \* 霸权国地区战略高）。<sup>①</sup> 因此，通过上述布尔代数公式可以看到，尽管 RCEP 尚未签署协议，但是其发展总体符合制度变迁成功的条件，可以对此保持理性乐观的预期。

另一方面，从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来看，冷战结束至今的亚太地区经济秩序变迁可以根据外部冲击分为四个阶段，每一个阶段的地区秩序都受到了不同类型的外部冲击和政治经济因素的综合影响。前三个阶段分别是：制度构建（1989~1997）→制度停滞（1998~2008）→制度制衡（2008~2016），现为第四阶段。在前两个阶段，由于美国实力的绝对优势，地区内处于单极时刻。

① \* 号表示“且”，+号表示“或”。

在第一个阶段，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促使亚太各国/地区开始致力于推动地区内一体化建设，美国对最初的制度构建起到了强有力的推动作用。在美国的积极推动下，以 APEC 为代表的开放型地区主义制度取得了以“茂物目标”为象征的阶段性胜利。在第二个阶段，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增加了东亚国家/地区对 APEC 等制度的不信任，而“九一一”事件则降低了美国参与地区合作的积极性。因此，东亚国家形成了新一轮以“10+3”为代表的地区合作浪潮，但由于各国之间的分歧，最终未能形成有约束力的制度安排。随着中国实力的持续高速增长和 2008 年金融危机对美国经济的沉重打击，地区内中美力量差距开始缩小至同一数量级。在第三个阶段，由于中美在亚太地区形成了一种局部均势，反而增加了大国提供地区公共物品竞争的积极性。在奥巴马政府“亚太再平衡”战略的背景下，亚太地区制度构建已经出现了多元化趋势，美国主导的 TPP 和非美国主导的 RCEP 等地区制度的并行推进，一定程度形成了“地区规则制定权”之争。第四个阶段即 2016 年以后，尽管尚未呈现最终的结果，但在新一轮反全球化的浪潮中，随着美国退出 TPP 和回归经济民族主义的传统，将存在两种可能的走向，同时也取决于中国提供公共物品的意愿。第一种可能是制度变革，即如果美国不愿意提供公共物品而中国愿意承担地区大国的责任时，其结果将是东亚地区秩序的转变——构建亚太地区政治经济新秩序。第二种可能是制度回潮，即如果中国提供地区公共物品的意愿下降，地区合作失去动力，将会形成“金德尔伯格陷阱”，使现有的地区合作出现倒退，大国之间重回传统现实主义的竞争路径。需要指出的是，上述讨论的前提是作为新兴国家的中国始终具有推动地区合作的意愿，而中国参与和持续提供地区公共物品的意愿最终取决于在地区制度中的收益，这是维系和深化地区合作的关键。在地区力量对比接近时，在制度构建阶段，新兴国所倡导的地区合作并不存在单极格局下初期所面临的生存困境问题，因此中国需要有战略定力，更多着眼于地区制度的可持续性。综上，中国需要倾听发展中国家的需求，通过合作和磋商进行渐进式的、能够给发展中国家同时带来效益的变革，在学习不断完善对制度的认识，从而做到制度的不断创新与变革。<sup>①</sup>

---

<sup>①</sup> 唐世平：《国际秩序变迁与中国的选项》，载《中国社会科学》2019 年第 3 期，第 200 页。

has attracted widespread attention to the question of the sustainability of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The article builds on this theory by starting with the core elements of institutionalism, proposing an institutional logic of withdrawal that is based on dynamic interactions between three factors: membership identity; preferences vis-à-vis treaty obligations; and the level of uncertainty of the consequences of withdrawal. The behavior of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with respect to withdrawal from institutions is a function of both historical continuity as well as the unique circumstances of the current era. Trump's withdrawal from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will not have decisive impact on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at large or on the trajectory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China should pay close attention to the behavior of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from which the United States withdraws, and should consider comprehensively the political, legal, and economic ramifications. It should avoid simplistic condemnations of American behavior based on moral grounds and should consider institutional withdrawal as a possible diplomatic strategy that China might deploy as needed in safeguarding its own national interests.

**Key Words:** Institutional Withdrawal;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Unilateralism; Multilateralism; Trump Administration

**About the Author:** Wang Mingguo is a Professor in the School of Law of the Shanghai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

### **Capacity Allocation, Institutional Compatibility and Strategic Focus: An Analysis of Success and Failure of Multilateral Trade Cooperation Institutions in the Asia Pacific Region**

Ye Chengcheng

**Abstract:** Following the Cold War, the Asia Pacific Region developed a wide range of institutions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which were rapidly integrated into the regional order. The development of these institutions went through different phases and achieved different outcomes. Theories of institutional evolution indicate that the developmental processes of regional institutions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phases: institutional need; institutional creation; and institutional maintenance and expansion. Different factors play different roles during each of these phases. This article identifies four distinct periods in the evolution of institutions in the Asia Pacific Region in the Post-Cold War era and attempts to illustrate the above theory by consider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representative institutions prominent during each period. As such, when we consider the case of China, as the strategic focus of the hegemonic state vis-à-vis regional cooperation is on the decline, and as great states are trending towards power parity, China needs to maintain sharp strategic clarity if it wants to advance regional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must emphasize mutual benefit and win-win initiatives within the context of regional cooperation.

**Key Words:** Capacity Allocation; Institutional Compatibility; Strategic Focus; Asia Pacific Institutions for Multilateral Trade Cooperation

**About the Author:** Ye Chengcheng is an Assistant Researcher in th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at the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